

興隆場－抗戰時期四川農民生活調查（1940-1942）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Wartime Rural Sichuan as Seen by Isabel Crook and Yu Xiji）

1940 至 41 年，伊莎白和她的中國同事俞錫璣曾在興隆場花一年左右時間籌建一個食鹽供給合作社，俾使當地窮苦百姓免受鹽價暴漲之苦。該活動由中華基督教會（中國新教教會的全國性組織）發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新教在中國的聯合組織，旨在推動基督教當地語系化）提供資金、支援，並得到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批准。美國衛理公會特許項目負責人孫恩三在當地教會屬地修建辦事處並為工作人員提供住宿。以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實驗聞名的晏陽初——當時已從河北定縣遷來四川並在鄰縣成立了鄉村建設學院，則派來兩位專家進行培訓，指導創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伊莎白和俞錫璣的具體工作是在全鄉作逐戶調查，以期全面深入地瞭解當地農民的經濟生活狀況。

伊莎白如今已經年邁，由她的兒子柯馬凱來介紹她們的項目。

伊莎白的前言

一、地理位置與時代背景：

璧山縣城¹位於重慶以西 70 多公里處，兩地之間有一條新修的公路相通。從璧山往西，沿著一條蜿蜒的山間小路走大約 20 裡地，便來到一個叫做興隆場的地方。這裡丘陵環繞，梯田層疊，在方圓 20 公里的範圍內分佈著 1500 來戶人家，總人口近 8000 人。1940 至 41 年，我和我的中國同事俞錫璣作為一項教會活動的成員，曾在興隆場花一年左右時間籌建一個食鹽供給合作社，俾使當地窮苦百姓免受鹽價暴漲之苦。該活動由中華基督教會（中國新教教會的全國性組織）發起，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新教在中國的聯合組織，旨在推動基督教當地語系化）提供資金、支援，並得到了國民黨中央政府的批准。美國衛理公會特許項目負責人孫恩三²在當地教會屬地修建辦事處並為工作人員提供住宿。以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實驗聞名的晏陽初——當時已從河北定縣遷來四川並在鄰縣成立了鄉村建設學院，則派來兩位專家進行培訓，指導創辦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社³。我和俞錫璣的具體工作是在全鄉作逐戶調查，以期全面深入地瞭解當地農民的經濟生活狀況⁴。

那時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正處在相持階段，兩年前國民政府剛剛被迫遷都重慶，將四川作為指揮全國抗戰、向各戰場輸送人力物力支援的大後方。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種近似自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是沉重的負擔業已將四川農村經濟逼至崩潰邊緣，另

¹ 璧山縣過去屬四川省，現已劃歸重慶直轄市。

² 此前中國農村地區教會的主要任務有三：福音傳道，公共教育及公眾健康；隨後把注意力轉到改善農民生活、推動經濟發展上來，希望在這方面有所作為。孫恩三身為中華基督教會的執行委員，受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之邀，從山東的齊魯大學奔赴四川主持此項試驗計畫。

³ 晏陽初本人當時不在鄉村建設學院，具體工作由剛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的社會學家蔣旨昂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負責。蔣經常光顧興隆場，對學院派來的兩位合作社問題專家給予工作上的指導。我們並不瞭解那時他還在附近的另外兩個鄉從事個人調查，見蔣著《戰時的鄉村社區政治》一書（鄉村建設學院 1941 年出版）。

⁴ 俞錫璣從上海大學獲得社會學學位後，又師從北平協和醫學院的浦愛德（Ida Pruitt），接受了進一步的社會學工作訓練。我本人先是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心理學學位，然後來到中國，在四川邊遠地區從事人類學調查和研究。受孫恩三先生之邀，我的調查工作隸屬於中華基督教會的鄉村建設計畫，薪水則由加拿大婦女宣道會支付。

一方面是淪陷區下江人的大量湧入為當地創造了巨大的商品和勞務市場，到處生意興隆，日後成為洪水猛獸的通貨膨脹不過才初現端倪。對四川人而言，1938至42年是給他們帶來大動盪、大艱苦、也是大希望的五年。

二、先期準備：

本書內容初看不免駁雜紛紜，這或許能從資料的收集過程與方式中得到解釋。在成為入戶調查工作的指定人選後，我和俞錫璣的第一項任務——用孫恩三主任的話說——是去感知當地百姓的實際需求，為我們即將從事的鄉村建設計畫打下良好的群眾基礎。

投入到這項“感知”任務中去的除了我和俞錫璣，還有一位護士和教員（都是女性）。我們四人在鎮上開辦了一家診所，一所幼稚園，一個婦女識字班，並去小學校講授衛生學和公民學課程。由於孫主任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這裡，各種雜七雜八的事務性工作也落在我們肩上。

教堂就設在有著100多戶人家的興隆場鎮一條曲裡拐彎的石板街上，居住於此為我們提供了觀察和認識當地人的好機會。鎮上三天一集，屆時鄉下的男男女女都來趕場。我們向他們購買煤、木柴、蔬菜、糧食、牛羊肉、雞肉、雞蛋等日用品，買賣過程中彼此也變得熟悉起來。

按照習俗，已婚婦女可以像男人一樣出門趕場，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場所逗留，雖然遠道而來巴不得能有個地方歇歇腳，喝杯熱水，再聊上會兒天。不經意間我們的住所和辦公地在她們眼中竟成了這樣一個類似茶館的理想去處。大家同為女人，進來坐坐不會引起任何閒言碎語。隨著“顧客”人數日增，我們的好客名聲愈傳愈廣，極大方便了日後在全鄉範圍內所進行的逐戶調查。

人們趕場的目的不光是做買賣，還包括求醫問卦、探親訪友，或者僅僅來打聽消息。而興隆場的作用也遠不止於一個定期集鎮：鄉民來到茶館“講理”以解決爭端；哥老會各堂口在飯館、茶館或酒鋪裡招待四方袍哥、舉辦“聖會”；離家出走的女人和童養媳在郊外溜達，指望被好人家的收留。最後還有文、武兩廟，武廟內除了偶爾舉行宗教儀式，並設有固定賭場；文廟則是鄉政府和學校所在地。鄉公所作為鄉一級最高機構，肩負收稅、徵兵、維持地方治安之重任。

需要記錄的東西實在太多，為方便起見，我們決定採用編年體例，將戰時發生在這裡的大情小事如實呈現出來。

三、逐戶調查：

對當地農民經濟生活狀況的逐戶調查開始於1941年1月，這時我已在鎮上住了四個月，俞錫璣比我先到半年。我們一起設計、油印了一份包含四部分內容的調查問卷：第一部分確認戶主的性別、年齡及家庭住址；第二部分涉及土地擁有或租賃情況，以及房屋、農具、家庭副業生產工具（如織布機）、役畜、家畜和家禽數量；第三部分與家庭成員有關，包括年齡、職業、教育程度、與戶主關係、是否服兵役或從事其他社會活動等；第四部分調查居住條件，如房屋大小、家庭成員多少、擁擠程度等。

老實講，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展開調查工作並不十分有利。政府強行征糧、徵兵已經把農村地區弄得人心惶惶，四處匪患猖獗則更是雪上加霜。我們走街串巷不得不帶上木棍防身，以驅趕家家戶戶豢養的用來嚇唬盜匪或打鬼的猛犬。好在主人總能及時叫開狗，事實上至5月份當地百姓已將我們視為既無惡意、跟政府也毫無瓜葛的老熟人了。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儘量小心行事。

從一開始我們便試圖以串門子的形式進行調查。見面寒暄之後，談話逐漸轉入該家庭最為關心的話題。儘管初衷只是與對方建立良好關係，但這些未經事先設計的交

談很快為我們打開了一扇透視農民生活的視窗；帶著日益濃厚的興趣，我們花在家訪上的時間也一天天增加起來。而獲取資料的過程就像滾雪球，比方說，對一名病人的適當關切會幫助我們得到有關來世、老百姓眼裡的致病原因（如得罪鬼神）、治療方法、各式江湖郎中等一系列始料未及的資訊。當談到治病費用，或一人喪失勞動能力有可能給全家製造的巨大麻煩，又會自然而然引出耕地數量的題目，讓我們有更多問題可以提出。在另外一戶人家，可能老老少少正在幫一名雇來的木匠建造澆稻田的水車，於是租種土地多少、乾旱缺水、蓄水田比例及其對雙季稻的影響便成為大家談論的內容。這中間木匠的加入又使我們對他的工作有了較多瞭解，諸如材料來自哪裡，工錢如何結算，活是否忙碌，以及有多少時間種自家田地，——所有這些都可能成為一次家訪的前奏或後續。其他像生日宴會，到場賓客（有時包括巫師），生老病死，甚至掛在廳堂裡的一幅字畫，正在準備的一頓飯菜，激戰猶酣的一場吵架，或者熱鬧的鄰里家庭糾紛，也會為談話增添輕鬆且饒有風趣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不管講到哪兒，生計艱難始終是每一位談話者（包括其家人）最關注的問題，我們的經濟調查工作因此省了不少事。

雖然不是每次家訪都收穫頗豐，至少堅冰已經打破，我們得以向鄉民解釋成立食鹽合作社、抑制鹽價的好處，並以此為契機逐戶訪問，到了晚上再把調查結果按時間順序列印出來⁵。

從1月份到5月下旬，我們用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不慌不忙對全鄉1497戶人家挨個走訪了一遍⁶，在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同時，也徹底打消了壓在鄉民心頭、以為我們是替專門徵兵、徵稅的政府辦事的疑慮。

既然農戶各自感興趣的話題不同，而收集資料的任務與跟他們友好往來相比又不得不退居次位，我們事先便已做好調查表上的提問無法一一得到落實的準備（雖然走訪過程中一無所獲的情況極少發生），因此在有些表格裡只好寫下類似這樣的注腳：

“以上資訊源於對406位元土地擁有人的調查，代表516戶人家。”

起初因為官方統計資料高度保密，只對政府相關人員開放，我們無從查閱。隨著“新縣制”的推行，各鄉紛紛撤換了鄉長，晏陽初派來的兩位專家憑藉與興隆鄉新任鄉長的密切關係，在5月中旬將官方的戶口編查結果交到我們手上⁷。兩相對照，凡是發現有出入的地方（事實證明為數不少），我們都回過頭來重新審視自己的調查資料，有時拿得出充分證據證明是政府的統計出了差錯。比如某人的登記年齡為45歲，我們作家訪時卻碰巧趕上他在過30歲生日，竄改年齡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逃避兵役。然而縣政府很快派人要走這批資料，隨後又因造假明顯發回鄉裡複查，因此終結了我們的核對工作。

四、野外記錄：

這種地毯式調查所提供的僅僅是一幅靜態畫面，只有將資料按時間順序重新整理、羅列才能使鄉民生活變得鮮活起來。毋庸諱言，建立在逐戶訪問基礎上的調查日誌有相當一部分與他們的家庭生活有關。人們——尤其是婦女——喜歡談論家長里短、婚喪嫁娶、生老病死甚至神鬼故事，從其口中更容易聽到對於生活艱辛的訴苦與抱怨。

日誌中另有一部分內容記錄了掩蓋在小鎮平靜外表下的戲劇化衝突，小到街頭爭吵，大到對簿公堂，其中又穿插有哥老會開設賭場、舉辦“聖會”，鄉公所剿匪、徵

⁵ 調查表用中文填寫，打字則使用英文。

⁶ 之所以能在短短五個月裡做完這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與當地好幾戶人家往往租住同一個大院有關，以致很多情況下我們能一次同時走訪三四個家庭。另外到調查末期，從合作社培訓班畢業的五名學員也加入進來，我和俞錫璣於是帶領他們分頭進行工作。

⁷ 戶口編查先由各保分別進行，再報送鄉公所匯總。

兵、征糧和由此引起的糾紛，軍隊下鄉擾民以及縣政府為控制局面所採取的各項措施，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我們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完成離不開下面幾個人的大力協助，日誌的第三部分便是他們對發生在鎮上的大小事件的闡釋與評論。年輕的孫忠祿、孫忠堯（音譯）兄弟是當地鄉紳裡的兩位重量級人物，雖然不無保留，他們透露的資訊對我們瞭解鄉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人事變動還是大有裨益。與教區監牧劉志光（音譯；劉來自興隆場以外的四川某地）的交談則為我們理解認識本省特有的風土人情及時補了一課。當然還有鄉村建設學院的晏陽初派來的那兩位合作社問題專家：張福民和楊晨方（音譯）。張、楊二人被地方名流，包括推行“新縣制”以來先後委任的幾名鄉長奉為上賓；在駐紮興隆場的半年時間裡，和我們同吃同住，幾乎無話不談。從他們口中不但聽得到對負責改革地方政治的新任鄉長的評價，也獲悉了合作社籌建工作所遇到的麻煩及過去幾年裡鄉村建設實驗的成功與挫折。

還有一位人物不得不提，她便是被我們雇來作傭人的彭嫂。年近 50 的彭嫂是個寡婦；大約 20 年前彭家的日子相當好過，但自從遭土匪搶劫後，她就淪落到孤苦一人養活四個孩子的悲慘境地。彭嫂認識的人多，消息靈通，方圓左近凡是吵架、欠賭債、殺嬰、休妻、訂婚，沒有一樣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說起前因後果總能娓娓道來。跟她同樣神通廣大的是一個叫吳傳芳（音譯）的小夥子。吳來自一戶中等人家，也受雇在我們這裡幫忙做事，並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線索提供者，直到有一天他因為躲兵役而被迫逃走。

五、自我評估：

如前所述，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日誌乃建立於逐戶訪問、而非抽樣調查的基礎之上。至於素材的可靠程度，我們堅信它比同時期任何正式調查所取得的資料都更加真實。我們的優勢有二，一是調查者本人均為女性，且長期共處之後已為當地人所認同；二是與鎮上衛理教會的聯繫增強了普通百姓對我們的信任。這個有著 40 年歷史的教會雖然因為不跟地方官僚勢力勾結而無所作為，卻博得了清正廉潔的口碑。

日誌材料的來源既然廣泛，其代表性自不待言。傳統意義上的男性一家之主從來不是我們的惟一調查物件，很多情況下老人、年輕人尤其婦女都會參與談話。儘管受到性別方面的歧視，肩負管家重擔的女人並非足不出戶，事實上每當處理外面事務，從來少不了她們的身影。同時我們發現，富裕人家或地主家庭的男性家長（多半中年以上）似乎覺得跟像我們這樣的年輕女人待在一起有失身份，因此更願意把聊天機會讓給其他家庭成員；中小家庭的戶主或年輕男人卻正好相反，懷著對外面世界的人和事的強烈興趣，他們每每迫不及待地找我們攀談。

遺憾的是，有一部分人的情況在我們的調查日誌裡並未得到應有的反映，即鄉下的赤貧階層或曰“窮人中的窮人”。這些人多半住在築於高地的泥土小屋裡，遠離別人的視線之外；男人更樂意將自己藏得嚴嚴實實，以免遇上官吏，被抓壯丁，或者受到有權有勢人的欺負。至於那些為了有口飯吃，參與（或涉嫌參與）季節性搶劫的人則更是難見蹤影。還有因貧窮面臨破裂的人家也不會再以獨立家庭的名義出現在我們的調查記錄裡；一旦分家，其成員在我們筆下就成了某某人的親戚或財主家的傭人、長工。但上述赤貧階層中的一小部分人卻集中住在鎮上的一些破爛小屋裡，不但看得見摸得著，而且可以說就生活在小鎮的中心。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每次家訪話題的選擇完全不由我們，而是取決於當事人一時的興之所至。這種漫無邊際的談話以其隨機性和內容的多樣性彌補了其他方面的損失，固然有不可替代的優點，卻在我們最後整理資料時證明效率極低，因為缺乏一個系統的籌畫，所能做的只是將眾多事例按時間順序簡單加以羅列而已。然而壞事變好

事，最終奉獻給讀者的是對小鎮上各色人等採取不同方式應付種種生活突變的忠實記錄。

六、補記：

（一）鄉村建設計畫及其成員的命運：

食鹽供給合作社成立於 1941 年 5 月，但僅僅存在了五個月左右的時間，到 10 月份，原先在鎮上壟斷鹽業、哄抬價格的那個人竟一舉當選為合作社主任，至於這一幕的背後曾有哪些秘密交易發生就不是我們還嫌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來的了。不管怎樣，現在新主任可以公然打著合作社招牌而行囤積居奇之實，不但繼續高價售鹽，還能享受政府的減稅優惠；更惡劣的是，辦合作社的宗旨從此在鄉民眼中大打折扣。基於以上原因，此時已離開興隆場的兩位鄉村建設學院的專家很快返回並關閉了合作社，而我們為降低鹽價所作的種種打算也隨之泡湯。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一個外來人如果未曾深入研究瞭解當地的社會、政治現實，便貿然在傳統鄉村實行哪怕極小的經濟改革將會遇到多麼大的麻煩！

合作社的停辦同時也意味著鄉村建設計畫的壽終正寢。在沒有任何資助的情況下，我和俞錫璣決定自己動手寫調查報告，並請求保留已經填好的 1500 份調查問卷，卻遭到孫恩三的拒絕。孫堅持認為所有資料屬專案發起和贊助方中華基督教會所有，但同意暫由我們保管一段時間，這樣我們就能應成都《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⁸編輯的要求起草報告了。

接下來我和俞錫璣搬去成都，將大部分時間花在根據調查問卷整理表格上面——總共製作出 34 張表格，主要與人口（家庭結構、適齡服役人員多少及教育程度）和經濟（土地擁有或租賃、抵押，以及家庭主、副業生產情況，如織布機的類型、數量等等）有關。

然而報告尚未動筆，所有調查問卷便都被要走，我們的生活也從此發生了不可逆料的變化：俞錫璣先是受雇為成都的加拿大教會醫院從事醫務社會工作，隨後遠赴多倫多大學攻讀兒童心理學並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後在重慶的西南師範學院任教；我自己則奔赴戰火籠罩下的英國，與一名西班牙內戰時期參加過國際縱隊的英國人結婚，婚後我們又進入各自國家的軍隊服務。在興隆場進行的一年多社會調查只為我留下數十張表格、一堆散亂的日誌，以及當時所寫家信和無數難以忘懷的記憶，正是這些東西構成了眼前這本書的全部內容。

鄉村建設計畫結束後，其成員各奔東西，以下是他們的簡要情況：

孫恩三：孫先生的英文功底相當深厚，曾將基督教義翻譯成漂亮的中文，非常符合中國知識階層的口味。翻譯聖經也是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出資贊助的一項事業。然而孫後來所做的事情我們無從得知，只聽說他死於 1949 年以前。

朱秀診（音譯）：朱小姐去了重慶的一家教會醫院當護士，雖然終身未嫁，卻撫養和教育了一大群孤兒。幾年前她因病去世。

李文錦（音譯）：曾在興隆場擔任教員的李小姐在東南亞有親戚，後來移居那裡並結了婚，從此與我們失去聯繫。

李秘書：孫主任的秘書，沉默寡言、看上去像個學者的李先生後來顯然去了延安。很久以後我們才從其朋友口中獲悉，他之所以參加這項偏遠農村的福利計畫只是

⁸ 譯者注：1910 年，美國、英國和加拿大三國的五個基督教會在四川成都創建華西協和大學（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12 年後，在該校任教的戴謙和（Daniel Sheets Dye）等外國學者成立“華西邊疆研究學會”，考察研究華西地區（包括甘肅、西藏、雲南、貴州、四川等地）的人文地理和社會發展，並發行英文版《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誌》。著名動物學家劉承釗（1900—1976）曾受聘擔任雜誌自然科學部編輯，而美國考古學家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首次提出“廣漢文化”概念的《漢州發掘初步報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即刊於雜誌第六卷上。

為了躲避當局的抓捕。計畫結束後，李途徑成都，對朋友聲稱要去青海，其實指的就是陝北。我們當時可做夢都沒想到他會是一名地下黨員；印象中他踏實能幹、值得信賴，連給不識字的鄉民讀報紙這樣的小事也完成得一絲不苟。

蔣旨昂：負責向我們提供合作社問題專家的蔣先生先是在歇馬場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去位於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講授社會學，該學校後來併入四川大學。學識淵博的蔣很快晉升為教授，不到 40 歲就成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並未受到過多衝擊，大概在運動結束後不久（或者運動期間）因病逝世。

張福民和楊晨方：遺憾的是，我們一直打聽不到張、楊這二位合作社問題專家的下落。

（附）“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工作人員名單

1. 孫恩三，鄉村建設計畫負責人；
2. 陳文淵，主教；
3. 朱秀診，護士；
4. 李文錦，教員；
5. 俞錫璣，調研員；
6. 劉志光，璧山教區監牧；
7. 徐志平（音譯），衛理公會駐興隆場牧師。

（附）合作社指導人員名單

1. 晏陽初；
2. 蔣旨昂；
3. 楊晨方；
4. 張福民。

（二）後來的歲月：

這裡對我的丈夫大衛·柯魯克應該多交待幾筆，雖然他未曾參與興隆場調查，其政治活動卻深深影響了我的一生。當時我正在倫敦經濟學院雷蒙德·福斯教授的指導下收集資料寫作博士論文，決定暫時中斷學業，專門抽出一年時間陪他返回中國，考察發生在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

從 1947 年 11 月起，我們在冀南太行山區一個叫做十裡店的村莊一住就是半年，記錄下這裡的群眾實行土地改革的全部過程。我們後來的兩部著作——《十裡店：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1959 年出版）和《十裡店：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1979 年出版）——即源於這次調查的結果。

調查活動臨近尾聲、我們正準備啟程回國時，卻意外地接到邀請，在解放區新成立的外事學校教授英語。我們曾獲准親眼目睹共產黨的工作組如何幫助農民翻身，現在有機會報答主人的盛情，於是欣然前往華北平原一座剛解放不久的村莊，給借住在老鄉家的 35 名學員當起了教書先生。形勢發展得很快，不到半年時間外事學校便從鄉下遷入北京（當時叫北平）城中，並開始擴建為外國語學校（1954 年改稱北京外國語學院，即今天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前身）。跟待在鄉下的日子相比，學校生活同樣豐富多彩且意義非凡，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們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歷經種種不無爭議的知識份子改造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我們越來越捨不得離開這個處處充滿生機的國家了。

隨著大躍進運動的開展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我和大衛決定重返十裡店。這時十裡店已成為陽邑公社下面的一個生產隊，1959 和 60 年的夏季我們兩次去那裡住了幾星期時間，並將所見所聞記入《陽邑公社的頭幾年》一書（1966 年出版）中。事隔多年以後，原公社書記承認他在當時奉上面指示向我們提供了虛假材料；就在我們一致同意改寫此書時，這位當事人卻因患癌症離開了人世。至於興隆場的調查資料，這些年來一直束之高閣，我因為忙於教學，也從未做過什麼故地重遊的打算——那時的四川對外國人來說還是一塊禁地。轉機出現於 70 年代末，到 1981 年的夏天，我和俞錫璣終於再次踏上了興隆場的土地。

（三）一點補充：

這次重訪讓我們對早年進行的社會調查的價值有了新的認識；一年後我從北外退休，立即著手整理這批久被遺忘的資料。這時俞錫璣的興趣和事業都已轉向別處，寫作任務只能由我獨自承擔下來。即便如此，眼前這本書仍然是我們共同合作的結晶。俞的視力不好，已無法閱讀，但每當我將寫好的章節念給她聽時，總能收穫到坦誠而有益的批評、指正和評價。1983 年我們又一次回到興隆場，目的是去核對寫作過程中暴露出的新問題，並順便瞭解一下 40 至 41 年間那些曾在當地呼風喚雨的人物的命運。但願今後能有機會將這次訪問的結果公之於眾。

我雖然負責本書的最終執筆，當初從事調查活動時俞錫璣卻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我們倆各有所長，在許多方面都相得益彰。她稱得上一個合格的諮詢師，善於聆聽別人的傾訴，同時又不失一個務實的研究者對事物本身所持的懷疑精神；我則去蕪存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把她收集來的資料加以仔細梳理。遲至今日我才意識到將這些東西整理成書對有關學者來說或許不無裨益。中國一向有“文責自負”的傳統，但我堅持在書中使用“我們”的稱謂，因為若沒有俞錫璣所做的一切，本書也就無從談起。